

聲韻論叢 · 第二十四輯  
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 頁 1~36  
臺灣學生書局 2020年6月

# 「現代語言學」與「傳統語文學」之分 ——李無未教授〈辨正〉與〈問題〉 二文之回應\*

洪惟仁\*\*

## 摘要

本文目的在回應與答覆李無未（2017a、2017b）針對洪惟仁（1994）的批評。李文認為拙文有刻意「拔高」小川尚義（1907）漢語歷史語言學成就之嫌，以大量文獻否定小川尚義是第一位以現代語言學進行漢語比較語言學學者，甚至認為小川尚義的成就乏善可陳，與高本漢無法比擬。本文檢視其所舉反例，一一回應，細節上接受其指教，但仍堅持在小川尚義以前並無現代語言學意義的漢語比較語言學研究。結論認為兩人對小川尚義評價所以有南轅北轍之差，在於「史觀」不同，因而提出「研究方法決定論史觀」，認為在西方比較語言學未傳入日本以前，日本不可能有比較歷史語言學意義的研究。最後認為「現代語言學」和「傳統語文學」是不同分科，相輔相成，互相印證，才能更具證據力。

**關鍵詞：**小川尚義、比較歷史語言學、方法論、現代語言學、傳統語文學

---

2020.07.09 收稿，2020.09.22 修訂稿收件，2020.09.29 通過刊登。

\* 本文原在 2016 年臺北教育大學舉辦的「語文教學暨第三十四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宣讀。經多次修改而成。修改期間承蒙大阪大學林初梅准教授，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李壬癸院士、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連金發教授及三位匿名審查人指教，謹此致謝。又主編吳瑞文教授助理林秀蓮小姐在排版期間為本文錯、別字及格式問題不厭其煩再三與作者本人討論修正，在此一併致謝。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退休教授

## 一、前言

2016 年 5 月 13、14 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舉辦了「語文教學暨第三十四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邀請我評論廈門大學李無未教授投稿的主題在批判拙文有關小川尚義和高本漢比較的論文。李先生跨海來台「踢館」，主辦單位又請我講評，頗有捉對廝殺，看好戲之意。

拙文〈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之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以下簡稱〈拙文〉) 1994 年發表至 2016 年已經 22 年了，引用的不少，私下討論的也有，但像李教授這樣，寫專文、認真指教的，倒是第一人。拙文發表當時，我在語言學界才剛初出茅廬，見識不足、思慮不周之處在所難免，能夠得到高手指正實在是求之不得的事。

李先生是中國有名的漢語文獻學家，對中國、日本的漢語研究史瞭如指掌，曾發表《音韻文獻與音韻學史》、《日本漢語音韻學史》、《漢語史研究理論範疇綱要》、《東亞視闊漢語史論》、《日本近現代漢語語法學史綱》等相關的重要著作，尤其對於日本的漢語研究史的研究在中國可謂無出其右者。相對而言，我只對閩南語文獻、閩南語研究史比較熟悉，宏觀的漢語研究都要引用其他前輩的研究。李先生既然是漢語文獻史專家，他從宏觀的角度提出指教，當然是要感謝的。因此李先生這次親身來臺「踢館」，我不但不生氣，而且還很歡迎。

大凡，讚美聲人人愛聽，但是真心的批評比虛偽的讚美來得可貴，所以我還是把李先生當作知音。知音難覓，專家的批評即使有誤會也比無人理睬值得安慰。我借這個機會正好學習一下、充一下電，以作為將來修正錯誤的基礎。為了回應他的指教，我也專門寫了本文，詳細回覆他的質問，對於他的指正也表示感謝。

〈拙文〉(洪惟仁 1994) 分四節：第一節「提要」、第二節「前言」，重點在第三節「論文內容之比較」、第四節「學術地位之比較」。李先生針對第三節簡短地肯定說：「以比較的形式，用大量史實說明高本漢和小川尚義各自漢語音韻學研究的學術特點以及所做出的突出貢獻，進而突出小川尚義漢語音韻學研究的學術價值。」但讚美聲小，批評聲大，其批評的焦點在糾正〈拙文〉第

五節「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一節中所提有關高本漢和小川尚義周邊的語言研究史問題。李先生說〈拙文〉：「對小川尚義在漢語音韻學研究地位的評估確有用心『拔高』之嫌，論文中涉及到幾個有關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音韻研究的重要結論與史實並不符合實際。」（李無未 2017a：65）

感謝主辦單位請我擔任講評人，李先生的論文〈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音韻研究重要史實辨正——向洪惟仁教授請益一〉（以下簡稱〈辨正〉，後刊《聲韻論叢》20 輯（李無未 2017a：63-89））提交得很早，使我有機會對李先生大文先讀為快。我拜讀之後寫了一些感想，在 email 上和他討論、問難。沒有想到李先生又寄了一篇〈小川尚義中古音「擬音」及與高本漢比較「非對稱性」問題——向洪惟仁教授請益二〉（以下簡稱〈問題〉，後刊《聲韻論叢》20 輯（李無未 2017b：91-122））。這篇論文不止對於小川尚義在漢語語言史地位的補充，甚至還牽涉到小川尚義和高本漢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我們又在網路上做了冗長的討論。2016 年三月中旬我受邀去廈門訪問，得有機會當面向李先生請益，獲益良多。李先生也賜贈了很多原始資料，加深了我對小川尚義及日本漢語語言學研究史的了解。<sup>1</sup>

2016 年 5 月 14 日研討會李先生發表論文、由我評論，我們算是「正面交鋒」了。會議中論題尖銳，但是氣氛融洽。會後的 5 月 16 日，李先生特地到我的「治言齋」做客，當然不免飲酒論學一番。一天的論題都離不開日本的漢語研究史，這使我們對所謂「現代語言學」的立場越來越接近了。

<sup>1</sup> 2016 年三月中旬我正好受邀去廈門訪問。3 月 10 日李先生到我住宿的一家日式禪味旅館「如是酒店」見面。兩人一見面就開始論學。本來廈大許彬彬和李柏翰兩位教授約好要一起來的，但李先生怕這場會面變成鴻門宴，爭論不休，給晚輩看笑話，所以叫他們不要來。事實上我們相談甚歡，有關日本的漢語語言學研究，我想不論是李先生在中國大陸或者我在台灣都是寂寞的。也許是語文的隔閡，兩岸關心日本漢語語言學的很少，我在台灣，李先生在大陸，二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知音難覓。知音論學，即使有時針鋒相對，快莫大焉！那天中午李先生請我到一家日本料理店，繼續喝 sake（日本清酒）論學，本來李先生下午兩點有個約會，所以 2:00 叫當時受聘為廈門大學助理教授的台灣年輕學者李柏翰博士來接，但是因為談得太愉快了，又叫了一瓶日本酒，那時料理店早就打烊午休，整個店就剩一兩個店員招呼我們飲酒論學，直到下午四點多，才依依不捨的離別。鴻門宴變成煮酒論學，也算是語言學界的盛事。

不過也許我們都太忙了，沒有繼續對這議題認真追究，好好修正論文。10月收到李先生投給《聲韻論叢》的定稿，我看內容似乎沒有什麼修改。一方面我感覺我的回應並沒有改變他的想法，不免有點失望，但也使我很高興，因為如果他的論文沒有修改，我的這篇回應文也不必大動干戈地重新翻修了。所以李先生的論文和我的回應文，基本上採取「求同存異」的態度。他的指教有理，我接受，我不同意的也在此留個紀錄，拋磚引玉，希望讓讀者繼續深究，至於是曲直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李先生兩篇論文後來在《聲韻論叢》(2017)第20輯同時刊出，但我的回應文被遺失了。現在重新投稿，基本上保存原文，只做了文字上的修正。

詳細研讀了李先生的〈辨正〉及〈問題〉及其引用的部份重要文獻之後，我重新檢討、確認李先生評論，發現部份是可以接受的，但也有部份是立場不同，或錯引誤會，需要澄清的。本文將依在《聲韻論叢》的刊出版〈辨正〉(2017a)和〈問題〉(2017b)的內容分為四類一起在本文中回應：

- 一、錯引誤會：對拙文有所誤會或錯誤引用的，需要解釋。
- 二、批評有理：辨正有理，拙文有誤，必須修改。
- 三、觀點不同：對於「現代語言學」的定義或認識不同，互相尊重。
- 四、有待研究：是否為「現代語言學」研究，有待確認。

## 二、錯引誤會

李先生對〈拙文〉(1994)有所誤會或錯誤引用的，解釋如下。

### (一) 「漢語和閩南語分科」誤解為「閩南語不是漢語方言」

〈辨正〉(2017a: 66)引用〈拙文〉「小川在學術界的知名度主要是閩南語和南島語，漢語方面可謂默默無聞。」批評說：「將漢語、閩南語、南島語並列，其實，這樣表述並不合適。閩南語是漢語的一種方言，不是獨立的語言。」並以很大的篇幅引用趙元任、李方桂、張琨、丁邦新來證明閩南語屬於漢語方言。

答曰：閩南語屬於漢語方言是普通常識，衆所皆知，無須引用大家論證。我把漢語、閩南語並列，是從研究的角度：宏觀或微觀來分，以宏觀的角度

進行研究的是「漢語學家／專家」；以微觀的角度進行研究的是「閩南語學家／專家」。「閩南語學家／專家」不一定是「漢語學家／專家」，「漢語學家／專家」也不一定是「閩南語學家／專家」。

拙文中把漢語、閩南語、南島語並列，只不過是基於上述的認識：「閩南語學」和「漢語學」是不同的專業，並沒有否認閩南語屬於漢語方言這個事實。李先生質疑我一方面把漢語與閩南語並列，一方面又把閩南語視為漢語方言，「前後並不一致，是不是自相矛盾」(2017a : 67)。並沒有矛盾。誤會的原因也許是李先生久居大陸被養成「臺灣與中國不能並列」的觀念，連帶對「閩南語」和「漢語」並列變得太敏感了。

## (二) 將「漢語學家」錯引為「漢學家」

〈拙文〉(1994 : 63) 謂「要說戰前日本唯一的漢語學家實在非小川莫屬，然而研究伊澤的專著、專文連篇累牘，研究小川的鳳毛麟角，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伊澤主要的中國語研究、出版是在日本進行的，而小川尚義主要的漢語研究與出版是在台灣進行的。」〈辨正〉(2017a : 69) 引用為「要說戰前日本唯一的漢學家實在非小川莫屬……」，質疑說：「『漢學家』似乎是以『中國漢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者，那所指的範圍就十分廣泛了，涉及的領域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歷史、文學、語言、哲學等。以小川尚義研究的領域而言，他所研究的範圍主要指的是漢語，包括閩南語與南島語。這裏當然指的是漢語研究了，並不包括南島語。」

按原文是「漢語學家」不是「漢學家」，一字之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這裏我就不多作反駁了。

## 三、針對批評的反省

以上對李先生〈辨正〉一文對〈拙文〉批評的誤解做個解釋。但其批評也有頗多可取之處，有些地方批評有理有據，拙文確實有所疏忽，值得參考、修改。至於三之(四)小節小川尚義雖然承襲前賢是事實，但他有自己的創見，必須說明。

### (一) 小川尚義的現代漢語語言學在日本並不孤獨

〈拙文〉(1994: 66)引用六角恒廣《近代日本の中國語教育》(1961)認為日本戰前輕視「清語」，所採用的教學方法都是口耳相傳的方法，沒有像英語、法語那樣具有語言學分析的教學法。六角(1961: 15-16)說：

從明治初年起，上面對中國語的態度一直是不想為中國語培養出中國語學，可以說一直要使它庸俗化。學問的出路被堵塞，日本的中國語一直被壓在實用語的地位，在學校教育之中被排斥在角落裏，不承認其文化性……，在這種情形下，不可能產生科學地研究中國語的學習者與研究者。

那麼為什麼一直把中國語當作實用性的語言呢？六角教授(1961: 17)解釋說：

中國語所謂實用性和英、德、法語的實用性有很大的不同，英、德、法語雖也具有實用性，但有文法的、語音學的語言學的基礎，在實用的方面，語言學發生了作用，但是中國語只有實用的方面，沒有語言學的基礎。……

我將這些話理解為日本在戰前的語言學界沒有發展出什麼科學的「現代漢語語言學」(〈拙文〉1994: 66)，並認為小川尚義是戰前日本唯一的現代漢語語言學者，小川尚義的這篇漢語比較研究為戰前日本人唯一的一篇純學術的漢語語言學論文(〈拙文〉1994: 67)。

但六角先生講的是戰前日本的中國語教學沒有把語言學的研究成果運用在語言教學上，並沒有說戰前日本沒有現代漢語語言學研究。

〈辨正〉(2017a: 74-82)列舉了許多小川尚義以前的漢語學者，如伊澤修二、大矢透、後藤朝太郎、大島正健、猪狩幸之助，結論認為「洪惟仁教授

所謂小川尚義是漢語語言學史上第一個進行域外漢字音、漢語方言比較學者的結論也是不正確的。」稍後於小川尚義，到高本漢影響日本漢語研究的岩村忍、魚返善雄之前，也舉出佐藤仁之助、大島正健、滿田新造、高畠彥次郎、有坂秀世等，都進行過高本漢式的漢語語言學研究。

承蒙李先生賜教，我把戰前的漢語語言學重新審視一下，承認當時我對日本現代漢語語言學研究史並不熟悉，引用前人文獻，過度引申，確有疏忽。

但是我翻閱了他們的作品，也不能完全同意他所列舉的學者都是「現代漢語語言學」的學者。其中理由主要是我們對所謂「現代漢語語言學」的定義不同。李先生認定的漢語比較語言學家，我們認為他們只能說是語文學者，而非現代的語言學者，這一點我們將在「四、觀點不同」一節中討論。

但有些人不得不承認是現代漢語語言學者，至於他們的成就，不說閩南語研究，即使漢語音韻史的研究也大大不如小川尚義。至於其他人，他們在漢語語文學上或漢語教學上的成就不容置疑，但是不是「現代漢語語言學家」值得商榷。

以下討論兩位學者，其中後藤朝太郎（1908）和高畠彥次郎（1928-1930），可以認定是「現代漢語語言學者」，但他們都是出身於東京大學文科大學言語學科，並且都是小川尚義的學弟。

### 1. 後藤朝太郎

〈辨正〉（2017a：77）舉後藤朝太郎（1881-1945）為例說：「就是與小川尚義同時代的日本學者後藤朝太郎，1906年完成，1908年發表的《現代支那語學》（博文館）一書，也全面地論述漢字音比較理論，涉及到了許多中國方言，其系統性也遠遠地超出了小川尚義。《現代中國語學》被列為日本一百年來經典性的漢語研究著作。所以，洪惟仁教授所謂小川尚義是漢語語言學史上第一個進行域外漢字音、漢語方言比較學者的結論也是不正確的。」

根據日本維基百科，<sup>2</sup> 後藤朝太郎是當時日本出名的「支那通」、書法家，明治後期至昭和前期的語言學家，著書、編著超過110冊。他出版《漢字音の

<sup>2</sup> <https://ja.wikipedia.org/wiki/後藤朝太郎>（瀏覽日期：2016年3月30日）。

系統》(1902) 時還沒有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正式接受語言學訓練，其研究應該是傳統的文獻學，後來進了博言科，專攻漢語，才接受了「現代語言學」的訓練。他明治 40 年 (1911) 由文科大學言語學科畢業，算是小川尚義的學弟，《現代支那語學》發表的 1908 年當時他還在「大學院」就學中。

後藤朝太郎《現代支那語學》(1908) (不見日本維基百科所列著作書目，但日本國會圖書館網站可以下載) 確實是一本有深度的語言學概論，即使到現代，他的許多論述都不算過時，這本書系統地比較了當時可見的漢語方言（但也不出小川尚義所用的 Giles 的《英華辭典》(1892) 所載的 Parker 的方言語料）。但其研究只能說是共時的比較，而非歷史語言學的比較，後藤朝太郎 (1908) 和小川尚義 (1907) 可以算是 20 世紀初日本漢語語言學的雙璧。

後藤朝太郎《現代支那語學》在「自序」(1908：1) 中針對當時的日本漢語研究情況說：「近年我國的支那語（按指漢語）研究大為興盛，是東洋語研究上值得注目的事。但回顧今日所謂支那語研究僅止於實用的方面……應該進一步從學術方面來透視支那語的真相才行。所謂支那語的學術研究，是站在語言學的立場科學地觀察支那語，這是前人未開的難事業。」換句話說在後藤朝太郎的認知下日本在二十世紀初以前還沒有現代漢語語言學的作品，這一點合乎我們的認知。

後藤朝太郎 (1908：15) 在同書「有關支那語從來的研究程度」對於小川尚義有特別的肯定。他說：

相對於內容雜駁的 H. A. Giles 的《英華辭典》(1892)，儘管內容較少，但更精確的《日臺大辭典》(小川尚義 1907)，其語言學的價值遠遠超過。其卷首所載支那各地方的音韻比較研究給與斯學研究上很大的啟示。……因為為支那語研究投下至大的光明。

「為漢語研究投下至大的光明」一句話，等於肯定了小川尚義 (1907) 開創現代漢語語言學的功績。後藤 (1908) 並沒有討論到小川尚義 (1907) 的擬音，但這兩篇論文都是漢語比較語言學的重要作品，在宏觀的漢語共時比較方面，

後藤（1908）比小川尚義（1907）更精細而深刻，推斷後藤（1908）的研究參考了小川尚義（1907）。

## 2. 高畠彥次郎

〈辨正〉（2017a：79-80）說：

岩村忍、魚返善雄之前，滿田新造、高畠彥次郎、有坂秀世等都進行過高本漢式，甚至是超越高本漢式的漢語語言學研究。以高畠彥次郎《支那語の言語學的研究》（1928-1930）為例，……內容主要有：音聲史研究的材料、音聲史的研究、《廣韻》反切下字的研究、《廣韻》反切上字的研究、關於二百零六韻、四聲的研究、《切韻》資料研究。對《廣韻》的構擬與研究占了全文相當大的篇幅。

高畠彥次郎《音聲》最大的問題還是在許多看法上難以擺脫高本漢思維模式的束縛，使得自己的研究明顯帶有「跟著跑」的痕跡；在許多問題上，限於當時的認識水準，還停留在一般層次的理解上，比如「重紐」問題……

雖然如此，高畠彥次郎《音聲史的研究》對高本漢研究進行補充與修訂具有重要意義：從漢語中古音構擬入手，全面介紹高本漢理論與方法，並且融入自己的研究成果，改變了日本漢語音韻學研究的舊有面貌，引起了日本漢語音韻學界的很大震動，形成了以往所不曾見到過的學術格局……。

高畠彥次郎《支那語の言語學的研究》（副題《音聲史的研究》……）（1928-1931）是連載作品，李先生逐篇影印，在廈門賜贈了影印本給我。我讀後深受感動，可以確認這是一部現代語言學的作品，只不過如李先生所言「難以擺脫高本漢思維模式的束縛，使得自己的研究明顯帶有『跟著跑』的

痕跡」。但本書發表時間距離高本漢（1915-1926）最後發表之後只有兩年，是緊緊跟著西方現代語言學的腳步。我覺得他不僅是「全面介紹高本漢理論與方法」，而是參與了當代西方及中國的漢語語言學者最前進的漢語語音史研究的對話。

高畠彥次郎明治 42 年（1909）東京帝國大學言語學科畢業，算是小川尚義的學弟。<sup>3</sup> 以他的學術背景，做為現代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能力應該是無可懷疑的。

高本漢式的「歷史比較語言學」是後來的發展，事實上日本的現代漢語語言學在高本漢出道以前就已經由上田萬年由歐洲引進，後藤朝太郎及高畠彥次郎作為東京大學言語學科畢業生，能夠進行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並不奇怪。

由上述可知，小川尚義的現代漢語語言學在日本並不孤獨，但整個日本現代漢語研究族群都屬於東京大學博言科（1990 改名「言語學科」）的系統，這點是日本漢語研究史研究上必要的認知。再者，以上介紹的後藤朝太郎（1908）和高畠彥次郎（1928-1930）都比小川尚義（1907）晚，不能用來反駁「小川尚義是第一個現代漢語語言學者」的證據，但可以做為戰前日本本土的現代漢語語言學研究已經相當發展的證據。

## （二）最先將高本漢介紹給中國學界的不是羅常培

針對〈拙文〉（1994：60）稱最先將高本漢學術研究成果介紹給中國的是羅常培（1935）反駁說：「按，中國學者將高本漢漢語音韻學成果介紹給中國，羅常培肯定不是第一個人，他之前有許多學者已經進行。」〈辨正〉（2017a：81）其證據包括：

1. 林語堂翻譯珂羅倔倫（Bernhard Karlgren）就是後來稱作高本漢的《答馬斯貝囉（Maspero）論〈切韻〉之音》，完成於 1923 年 7 月，刊於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 1 卷第 3 號。又收於林語堂《語言學論叢》，上海開明書店，1933 年 5 月。

<sup>3</sup> 按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博言學科於明治 33 年（1900）改名言語學科。參《東京帝國大學一覽·從大正七年至大正八年》（1919：269-270）。

2. 趙元任翻譯的《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的諧聲說》，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論叢》第 1 卷第 2 號，1927 年 9 月。
3. 朱芳圃譯滿田新造《評珂羅倔倫 Karlgren 中國古韻研究之根本思想》，《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 6 集第 67、68 期合刊，1929 年 2 月 13 日。
4. 朱芳圃譯《珂羅倔倫諧聲原則與中國學者研究古聲母之結論》，《東方雜誌》第 26 卷第 21 號，1929 年 11 月 10 日。
5. 趙元任譯高本漢《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 本第 3 分，1930 年。
6. 王靜如譯高本漢《中國古音〈切韻〉之系統及其演變 (附國音古音比較)》，《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 本第 2 分，1930 年 8 月。
7. 林語堂《珂羅倔倫考訂〈切韻〉韻母隋讀表》，《語言學論叢》，上海開明書店，1933 年 5 月。

他如馮承鈞 (1929)、張世祿 (1931)、陳定民 (1932)、唐虞 (1934)、賀昌群 (1934) 等都對高本漢漢語音韻學做過介紹。(2017a : 81-82)

以上所舉證據確鑿，無可辯駁。必須承認在羅常培 (1935) 以前已經有很多人介紹高本漢的研究了。

### (三) 日本本土的現代漢語語言學是不是從 1937 年開始

針對〈拙文〉(1994 : 67) 所言「日本本土的現代漢語語言學應該從 1937 年岩村忍、魚返善雄合譯高本漢的論文輯為《支那言語學概論》開始萌芽的，通觀戰前的日本中國語學界，可以說沒有足以稱為漢語語言學的學術研究。」反駁說 (〈辨正〉第二節) (2017a : 79) :

日本學者介紹和評述高本漢漢語音韻學著作在岩村忍、魚返善雄之前就有人進行。比如滿田新造《カ-ルグレン氏古韻研究の根本思想を評す》……以批判高本漢漢語音韻學思想而聞名。高畠彥次郎《支那語の言語學的研究》……則全面而系統介紹了高本漢的漢語音韻學體系；

1930 年 12 月有坂秀世向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提交論文《上代音韻考》的提綱，其中《音韻論》，……慶谷壽信《有坂秀世〈音韻論〉》、《有坂理論の展開》系列論文……；金田一春彥《有坂秀世〈音韻論〉私觀》……。岩村忍、魚返善雄《支那學者カ-ルグレンの業績》……。這些都是日本學者對高本漢漢語音韻學理論全面引入之始，更是日本邁向現代的漢語音韻學的一個轉捩點，僅僅提岩村忍、魚返善雄合譯高本漢的論著肯定是不夠的。（以上引文略去出典註明，敬請詳參原文）

由上列書目可以證明 1937 年以前日本音韻學界已經有許多討論高本漢的論文了。李先生博學多聞，修正了我的誤斷。我所以做上述的論斷是引用了岩村忍、魚返善雄《支那言語學概論·譯者序》（1937：1）：

（高本漢）教授的大量勞作中有幾篇已經譯成支那語，在日本有部份的引用或抄譯，尚未見原著，不免遺憾（詳參譯者《日華學報》第 56、57 號所載）。

由李先生所引文獻可知，岩村忍、魚返善雄（1937）的功績是把高本漢完整的論文「譯介」給日本學界，但早在 1924 年，在高本漢的博士論文尚未完全發表以前，滿田新造就已經把高本漢的研究法介紹給日本學界了，而前述高畠彥次郎《支那語の言語學的研究》（1928-1931）已經詳細討論高本漢的研究。

其實高本漢的方法就是近代歐洲比較歷史語言學的方法。日本的漢語研究自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博言學科成立以來一直都和西方漢語學界亦步亦趨，上田萬年在東京大學和文科就學中受到英國教師 Basil Hall Chamberlain (1850-1935) 語言學（當時叫「博言學」）課程的啟發，1890 年到德國留學，在柏林大學受到東方語言學、比較語言學學者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 的薰陶，又在來比錫大學師從「青年語法學派」(Junggrammatiker) 大師 Karl Brugmann (1849-1919) 學習比較歷史語言學，回國後把當代最新的比較

歷史語言學引進日本，<sup>4</sup> 被尊稱為「日本現代語言學之父」。日本的比較歷史語言學直接繼承德國的青年語法學派，不待高本漢的介紹。小川尚義如果不是上田萬年的學生，相信也做不出為中古音的擬測的研究，頂多像他的前輩抄襲西方學者的研究結果而已。把高本漢的研究法介紹給日本是一回事，用比較法進行歷史語言學研究又是另一回事。究竟高本漢對日本學者的現代漢語語言學研究影響到甚麼程度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期待大方之家有以教之。

#### (四) 小川尚義韻鏡學的淵源

日本漢語音韻學得天獨厚的優勢是日本保存了在中國已經遺失的《韻鏡》，並且從文雄、太田全齋以來，所謂「韻鏡學」的學者輩出。相對的高本漢在撰寫他的博士論文（1915-1926）時並沒有見過《韻鏡》原本。最可笑的錯誤如高著原文誤把 Maspero 所介紹的 Yun-king 譯為「韻經」（原文，頁 34），趙元任等的譯本（1940：22）才修正為「韻鏡」。

〈問題〉（2017b：101）說：

……許多學者所稱頌的小川尚義漢語中古音研究貢獻，並不是他一個人的「發現」或「發明」，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幾百年來，日本學者研究《韻鏡》語音「水到渠成」的自然結果。其《韻鏡》「擬音」模式，早就形成。如此，小川尚義研究《韻鏡》語音的理論與方法模式「原型」是清楚的。

我非常同意小川尚義承續了日本「韻鏡學」的傳統。他的論文（1907）也引用了《漢吳音圖》的漢音、吳音（但我認為這反而是他的敗筆，因為太田全齋所記的漢、吳音是人造的，不完全是實際的日語音讀，不適合拿來比較）和漳音、泉音以及其他漢語方言漢字音比較。

所有的研究都必須承襲前人的研究成果，重點是他有沒有超越前人之處。

<sup>4</sup> 有關早期上田萬年受到西歐語言學及德國青年語法學派影響及他對抗「古學派」，創立「科學派」語言學的歷史，詳參李妍淑（イ・ヨンスク 2005：97-110）。

小川尚義的研究當然承襲日本「韻鏡學」前輩的研究，但我們看所有先前的研究，如猪狩、佐藤（詳參下文四之（二）小節）無不拘泥於「三十六字母」，只有小川尚義提出了 41 字母說。這就是重點，也就是李先生所謂的「亮點」。

〈問題〉(2017b: 101-102) 特別就這一點讚賞說：

小川尚義後於猪狩幸之助 9 年，有些地方理所當然要「後出轉精」。小川尚義將三十六字母中的「照組」一分為二，即所謂「照二組」、「照三組」（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26-35 頁，臺灣總督府，1907），這確是他研究《韻鏡》中古音的一個亮點。清人陳澧《切韻考》系聯《廣韻》反切上字，分為「莊初崇生」與「章昌船書禪」兩組，表明，他們是有對立的，所以，是兩套聲母。小川尚義是否看過《切韻考》不得而知，但「英雄所見略同」確是事實。這是與許多日本學者研究《韻鏡》中古音不同的地方。

問題是小川尚義為什麼會有異於其他日本學者的洞察力？我相信是因為小川尚義受過現代音位學訓練，具有「對立」(contrast) 與「互補分佈關係」(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s) 的觀念。照二和精系在《韻鏡》具有互補分佈關係，一眼就可以看出和照三是對立的兩組聲母，根本不必要採用系聯，就知道是兩套聲母。是「三十六字母表」混同了，不是《切韻》原來的聲母系統。這一點高本漢真的是「英雄所見略同」，所以他才分得清照二、照三。但《韻鏡》明明註明「喻」母分為喻三、喻四二類，高本漢卻沒有察覺，所以他的中古音聲母只有 40 個。這是小川尚義比高本漢高明的地方。

小川尚義是從現代語言學的立場，才有超越前人的發現。說他的成就是前人智慧的結晶也可以，但其成就絕不只是前人的研究的總結或抄襲，說他的成就只是「日本學者研究《韻鏡》語音『水到渠成』的自然結果」，不免故意貶低他的成就。再者，他的擬音不是日本傳統的音韻學，而是師承上田萬年所傳授的西方「比較歷史語言學」，這和拘泥於「三十六字母」，抄襲 Volpicelli (1896) 擬音的前人也完全不一樣（詳下文第四節之（一）、（二）、（三）之 3、（三）之 4）。

## 四、觀點不同

所謂「觀點不同」指的是立論的出發點不同，也就是「史觀」的不同。具體的說，就是對於所謂「現代語言學」的定義不同。如果辯論的雙方對於議題的定義不同，議題沒有焦點，是無法辯論的，這是「語意學」的基本常識。當然，定義是可以討論的，定義不同，那麼要辯論的議題變成「如何定義」，定義有共識了，才能繼續辯論，「真理」才「越辨越明」。如果辯論的雙方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各說各話，各持己見，問題沒有交集，即使爭得臉紅耳赤，也「越辨越糊塗」。

### (一) 「現代語言學」的定義與立場

〈拙文〉(1994: 26) 開宗名義說：

高本漢於 1915-26 年發表了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的論文，……1940 年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參照高本漢後來的修正，譯為中文，題為《中國音韻學研究》，對漢語音韻學、方言學造成極大的影響，在漢語語言學史上獲得極高的評價。然而類似的工作在漢語語言學史上高本漢並非第一人，早在 1907 年小川尚義即以現代語言學的方法，作廣泛的漢語方言及域外漢字音的比較，並擬測了中古聲母、韻尾的音值，在若干方面得到更合理的結果。

又云 (1994: 33)：「小川尚義和高本漢都是接受現代語言學訓練過的語言學家，也從事過漢語歷史比較語音學的研究。」

但我對於何謂「現代語言學」並沒有明確地下定義，我擬在此明確的將所謂「現代語言學」定義為「建立在共時語言學基礎上的語言研究」。很多學者把「現代語言學」定為索緒爾提倡「共時語言學」(1919) 開始，在此以前都是「語文學」(philology) 研究。事實上索緒爾只是確立「共時語言學」的地位，並不是說「共時語言學」是索緒爾所建立，在此之前沒有共時語言學的研究，

事實上以共時爲基礎的語言學在十九世紀青年語法學派已經確立了。<sup>5</sup> 1919 年以前小川尚義和高本漢利用現代方言語料進行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不是以共時語言學爲基礎的嗎？

根據這個定義，我把現代語言學誕生的時間提早了一點。十九世紀的歷史語言學也要分爲兩個時期，前期以文獻爲基礎的研究方法只能說是「語文學」或「古典文獻學」(philology)，不能算是「語言學」(linguistics)，但後期，從青年語法學派創立以後，開始以「共時語言學」爲基礎的研究就應該算是「現代語言學」。

高本漢的研究不能否認也是「以共時語言學爲基礎的歷史語言學研究」，他所用的音標雖然不是 IPA，卻是經過嚴格定義過的瑞典式音標，而且以現代漢語方言材料做爲古音擬測的證據，而不是純粹的文獻考證，這樣的研究不能說是「語文學」，應該算是「語言學」了。

我在〈拙文〉(1994 : 70) 最後五節「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中從語言學研究史的角度簡單地討論到「現代漢語語言學」的歷史說：

……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也開始在東方萌芽，先是 Marshman 1809 年的論文從漢梵對音，為古漢語擬出一套濁聲母 b、d、g，並指出漢語、暹羅語、藏語、緬甸語的關係。然後漢語方言辭典紛紛出版，1817 年基督教東傳的開拓者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出版官話音的《華英字典》，1837 年基督教新教傳教師麥都思 (W. H. Medhurst, 1796-1857) 出版漳州音的《福建方言字典》。從此以後，漢語方言字典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而集方言之大成者，先是 Williams 1874 年的字典

<sup>5</sup> 上田萬年在他留學前夕發表文章主張「以博言學爲基礎的科學派打倒古學派的控制。」其差別在「古學派」研究的是書寫的語言，「科學派」研究的是活的語言。他說文字像語言的照片，只有研究真人的面貌才是博言學這個說法類似索緒爾在《一般語言學概論》所說的「文字只是語言的相片，研究語言只靠文字，好像認識一個人只要看相片，不看真人面貌」一樣可笑。這種重視活語言的觀念可以追溯到德國的青年語法學派。上田留德之後這種的信念更為加強（參李妍淑 2005 : 98-99）。共時語言學的基本信念是研究活的語言，這和只研究文獻語言的「古學派」是南轅北轍。

蒐集了四種方言，其後 Parker 在 Giles (1892) 的大字典裏蒐錄了 11 種方言，為當時的漢語方言及域外漢字音的比較研究提供了基本材料。Volpicelli (1896) 及小川尚義 (1907) 的研究就是根據這些材料所做的。漢語語言學的研究可以說是這樣地經過一世紀的資料累積而慢慢地學術化的，而當小川尚義、馬伯樂、高本漢把較發達的印歐語言學研究法引進到漢語語言學之後，才能稱為科學的研究，而誕生了「現代漢語語言學」。

這一段話雖然不是明確的定義，也已經表示我的「觀點」了。不管是否明確的定義，依拙見凡是不合乎這個標準的漢語研究都不能認定是「現代漢語語言學」，甚至不承認其為「以共時語言學為基礎的歷史語言研究」的「語言學」研究，只能算是「語文學」研究。

李先生有一篇大文〈高本漢「二手材料」構擬《廣韻》之檢討〉(2008) 對高本漢的嚴謹度提出嚴格的批評。他指出高本漢不但南方方言的語料是二手材料，即連他宣稱自己調查的北方方言都可能是二手材料。關於北方方言我不了解，至於引用南方方言的二手材料，高本漢本人也從未否認。

高本漢很看不起那些傳教士的紀錄，蔑稱他們是 amateur (門外漢，中譯「愛美的」)。但他的論文對南方方言嚴重地缺乏資料，因此不得不抄襲那些「門外漢」的語料，並且抄襲的時候也難免不求甚解的引用。他批評 Parker 的錯誤，自己也一樣錯得可笑 (詳參〈拙文〉1994 : 43)。

我們認為，雖然那些傳教士的紀錄有缺點，但也瑕不掩瑜，對於現代方言越了解、越深入的人，越能夠認識那些紀錄在語言學上的價值，並能善加利用。因此我願意把現代漢語語言學的萌芽提早到高本漢以前的基督教傳教士的漢語紀錄。

不過我認為，高本漢是否有錯不是重點，重點是他為漢語語言學提出了一個嶄新的研究方法。即使他的嚴謹度不足、其結果有很多錯誤，但瑕不掩瑜。高本漢無論如何應該是「漢語語言學之父」，而趙元任則是「漢語語言學之母」(參〈拙文〉1994 : 61)。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這是自然的道理 (〈拙文〉

1994: 71)，如果沒有高本漢，我認為大概很難、或者不容易那麼快產生後來那麼多傑出的漢語語言學者，不止中國的漢語學者，也包括日本的現代漢語語言學者。我們不能因為開創者有一點錯誤就全盤否定他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

因此〈拙文〉的著眼點在方法論（詳參「學術地位之比較」一節及本文六之（二）小節「研究方法決定論史觀」）。我為什麼特別重視小川尚義，原因就是他採用了「以共時語言學為基礎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的方法。即使他的格局不如高本漢，嚴謹度也不夠，採用的大部份是 Parker 提供的傳教士的「二手材料」。重點是他的研究方法正確，其中古聲母擬測也比高本漢接近後來漢語歷史語言學者的共識（詳參〈拙文〉1994: 59）。

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發表於 1907，比高本漢得到博士學位的 1915 年早了 8 年。這在漢語研究史上非常有意義，是應該特別肯定的。

小川尚義是不是「第一個以共時語言學為基礎進行歷史語言學研究」的東方學者，是可以檢討的。但要檢討，必須站在相同的「立場」才有意義。

因為我和李先生在「現代語言學者」的定義上沒有共識，因此在李先生二文中，有關誰是「現代語言學者」發生歧見是必然的。

## （二）小川尚義（1907）的中古音構擬有「邏輯謬誤」嗎？

〈問題〉（2017b: 113-120）第三節針對小川尚義（1907）的中古音有嚴厲的批判。在「（三）小川尚義『構擬』《韻鏡》中古音與其它方音比較的『邏輯謬誤』」中提出了：

一、方音文獻的「二手性質」，基本上不是他自己調查的，而是引用外來的。……這些方音文獻語音標記，往往是「音值」和「音位」記音不分，「異質」特點突出，顯得十分混亂。

二、小川尚義用「構擬」《韻鏡》中古音與其它方音比較目的和意義究竟是什麼不清楚。……據他自己所言，是為便於理解現代音之的分歧，但僅僅理解了「現代音之的分歧」就達到語音研究的目的了嗎？歷史語音學研究的任務是揭示語音變化的規律，弄清楚造成語音「差異」

背後的「原因」，從而對「現代音之的分歧」作出合理的解釋。不以此為目的語言研究，學術意義當然會大大折扣。

三、小川尚義用「構擬」《韻鏡》中古音與其它方音比較只有一般性描寫而沒有語言學意義上解釋。理解現代音之的分歧，就必須對「分歧」現狀進行科學的描寫，由此，才會進入到下一個研究階段。……因此，研究程序上的「邏輯」出現了紊亂。

四、小川尚義用「構擬」《韻鏡》中古音與其它方音比較的結論也不清楚。要揭示「現代音之的分歧」結構面貌，必須在利用程式和方法描寫之後，加以歸納，給出一個語言學意義上解釋性的觀點。比如他們之間有否「語音對應」和「親屬關係」？其「結構」與「音變」事實如何？有沒有「規律」和「例外」？如果有「規律」和「例外」，該如何處理？這些都沒有做，小川尚義方音比較還成立嗎？

由此，小川尚義「構擬」不成立是顯而易見的，「推理」不合乎邏輯，結論是「不可靠的」，「比較」失去意義當然也就在所難免了。

上引「構擬」二字都加了引號，有故意貶低其學術價值的意涵。總之，「小川尚義『構擬』《韻鏡》中古音『發現』與『發明』乏善可陳，完全是繼承和發展前人研究的結果，……並無獨創『構擬漢語中古語音音系』體系的驚人之處。」(2017b：120) 等於是全盤否定了小川尚義的成就，同時也否定了〈拙文〉的價值。

李先生上面所提出的四個判準，對歷史語言研究作嚴格的要求也無妨。但是站在語言研究史的立場，我不太能夠理解以這樣的判準來評價漢語歷史語言學的文獻有何必要。歷史語言學界有幾個人做到了？是不是做不到其中一項，其「構擬」、「比較」就失去意義？這是漢語歷史語言學界的共識？還是為了反對小川尚義及〈拙文〉而因人設事的「判準」？

譬如就第一點「方音文獻的『二手性質』」來說，如果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其他的音韻大家，包括高本漢、董同龢、王力、李方桂，通通不及格，更不用說

是十九世紀的日本學者了。試問有幾個歷史語言學家擬音都是一手資料，而不必引用別人的語料？有幾個能夠把所有語料的音值和音位用統一的標準重新整理之後再來擬音？高本漢是有這樣的企圖，但他做到了嗎？李先生大文〈高本漢二手資料構擬廣韻之檢討〉（李無未、秦曰龍 2008）不也同時否定了高本漢嗎？我認為「二手材料」不是問題，我指出高本漢錯誤解讀、錯誤引用材料，問題才大。高本漢在這方面的錯誤不少哩（參〈拙文〉（1994：43-45）「引用材料的轉寫錯誤」一節）。

李先生是否也要用同樣的標準去檢討一下他所認定的所有漢語歷史語言學者？如果不是這樣，那豈非故意刁難一百多年前開創漢語現代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小川尚義？

就第二點說，擬音不是為了「理解」現代方言的分歧，那是為了什麼？一個玄之又玄的擬音不能解釋現代方言變化的過程，無法藉以理解現代方言的分歧，這樣的擬音有什麼價值？（參〈拙文〉（1994：36-38）「（二）關於研究之方法」一節）

就第三點來說，所言「小川尚義用『構擬』《韻鏡》中古音與其它方音比較只有一般性描寫而沒有語言學意義上解釋」，第四點說沒有提出「語音對應」。這些都不是事實，這只要細讀原文就可以了解，不必多言。至於所謂「研究程式上的『邏輯』出現了紊亂」，這個「邏輯」是什麼意思，我更是墜入五里霧中了。

我在〈拙文〉（1994：38）已經說過：「小川尚義的擬音說明非常簡單，而高本漢的擬音說明非常詳細，講究論證的邏輯性。就整體而言，高本漢無論在資料的取得或擬音的論證，都比小川尚義更具學術嚴謹性。」又說：「小川寫本文（1907）的時代，描寫語言學尚不發達，當時世界上還沒有一套精密而通行的標音工具（如 IPA 者），小川文不夠精密是歷史的限制，不是小川尚義本人的責任。1935 年小川尚義發表《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即採用精密的國際音標，並做了廣泛的台灣南島語調查比較研究，證明了小川尚義是具有和高本漢相當的描寫語言學的能力。」

〈問題〉（2017b：113）說小川尚義是用羅馬字標音，而：

用羅馬字標音，如果按歷史比較語言學理論標準衡量，只能算是「擬音」，而不算是「構擬」。把小川尚義中古音「粗疏」的「擬音」，與高本漢精確「構擬」，放在一個天平上稱量，是不是顯得「怪誕不經」，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誰說羅馬字不能用來「構擬」？小川尚義和高本漢當時所用的都不是 IPA，而是加潤號的羅馬字。小川尚義所用的加潤號的羅馬字和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1971）所用的羅馬字都是當時西方漢學界通用的符號，比如 t, d 下加一點表示捲舌音（小川尚義謂之「舌尖裏音」）。我沒有聽過「擬音」和「構擬」這兩個詞可以用採用的符號是羅馬字或 IPA 來區分的。小川尚義所用的擬音符號不是普通的羅馬字，這是事實，但他對自己使用的符號有嚴格的定義也是事實（參見〈拙文〉（1994：54-56）的「符號對應表及音值說明」）。擬音的符號只要有一定的定義即可，不一定用 IPA，這是常識。

至於第四點「歷史語音學研究的任務是揭示語音變化的規律，弄清楚造成語音『差異』背後的『原因』，從而對『現代音之分歧』作出合理的解釋。」也就是「擬音說明」的問題，李先生的批評沒有錯，這是小川尚義不如高本漢的地方。我在〈拙文〉（1994：54）中也已經說過：

……高本漢對於前人的擬音無論是否「正確」都採取批評的態度，擬錯了自然不用說，即使擬對了（和高氏結論相同），沒有說明擬音理由也只算是一種「猜度」，譬如有關曉、匣二紐的擬測，Maspero 的意見和高本漢相同，可是高本漢並沒有一句讚美之詞，高氏（頁 272）批評說：

「Maspero 定曉母為清的舌根摩擦音 x，匣為相配的濁音 ς。他對這種說法並無給一個理由，所以仍然算是一種猜度。我們在未徹底考究這個問題以前不能接受他。」

由此可以看出高本漢如何重視擬音說明，擬音說明是否合理，是判斷「專家的科學」的擬音能否成立的一項標準。

用高本漢的標準來衡量，小川尚義的擬音到底只是一種「猜度」還是「專家的科學」的擬音呢？我們以為小川的情形並不像高本漢所批評的前人那麼糟糕，因為小川尚義的擬音都是伴隨著一個現代漢字音對照表的，對照表所羅列的資料本身就會說話，小川尚義所做的龐大的現代漢字音比較，本身就可以作為他的擬音的很好的證據，何況小川尚義往往會簡單地說明擬音的理由。譬如他把知系和二等照系擬為捲舌音，即說明是根據梵語對音；他把喻三擬為 -w；喻四擬為 -y 即說明是根據安南譯音。還有他把全濁音擬為：並 b、定 d、群 g、從 dz、邪 z、床二 dz、床三 j、禪 zh 是根據吳語。他對於沒有自信的擬音也不強作解人，注“？”以示存疑。可見小川尚義的擬音說明雖然簡單，也是有相當根據而且很謹慎的。

擬音說明的詳略和擬音的科學與否沒有關係，像高本漢做了那樣冗長的擬音說明，也並不能保證擬音一定正確。

根據〈拙文〉比較高本漢、Volpicelli、小川尚義、李方桂等各家的擬音，得出 4 點差異。結論認為高本漢的擬音前人都說過了（〈拙文〉1994：58）：

由以上四點看來，高本漢在聲母擬音方面真正的成就只是證實了 Maspero 有關曉：x、匣：r 兩母擬音的意見。高本漢有關聲母的擬音佔了 198 頁之多（239-436），才得到這一點成就，未免令人意外。

要說創意，高本漢的中古聲母擬音還真沒有什麼創意。

如果以李方桂（1980）的說法作為中古聲母擬音的定論的話，那麼小川尚義應該是漢語音韻學史上，第一位以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成就最接近定論

的現代漢語語言學家。((拙文) 1994 : 59)

由此看來，由於史觀的不同以及對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認識的差異，對小川尚義和高本漢研究的評價，李先生二文和〈拙文〉的看法竟有南轅北轍的差異。

### (三) 小川尚義(1907)以前有採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的東方人？

針對〈拙文〉(1994 : 72)：「小川尚義在高本漢的論文(1915)未出現以前的1907年，即發表了這篇漢字音比較研究。也就是說小川尚義是第一個採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進行漢語研究的東方人。」〈辨正〉(2017a : 74)反駁說：「小川尚義是第一個採用現代語言學方法進行漢語研究的東方人嗎？如果以現代語言學理論傳入臺灣，並用現代語言學手段研究臺灣地區方言而言，這個論斷也是可以再議的。」

但他舉的反例，有些很明確地不能算是「採用現代語言學方法進行漢語研究的東方人」。舉例如下：

#### 1. 新井白石的《東音譜》是現代語言學作品嗎？

〈辨正〉(2017a : 68-69)一之(二)節針對〈拙文〉「關於古音擬測」(1994 : 53)指出：「小川尚義不是世界範圍內漢語語言學史上第一個進行日本漢字音與漢語方言比較的語言學家」。他舉的一個反證是新井白石(1657-1725)於享保4年(1719)已經完成了《東音譜》，他說：

《東音譜》「五十字母音釋」是長崎唐通事把日語五十音依據漢語四種方音進行的音釋比較工作。根據研究，這些杭泉漳福音，就是「杭泉漳福」方音。

新井白石(本名君美)一般文獻只說他是「幕府政治家、國學者」，與語言學相關的有「也涉獵語言，著《東雅》、《東音譜》等，以古言·今言·雅言·俗言之分，論及日本語言之變遷，慨嘆借入來自大陸(韓語·支那語)，兼及聲韻分析」之類評語(參照《國學者伝記集成·続編》、《神道人名辭典》、《國

史大辭典·第1卷·慶長以來國學者史伝·和学者総覧》)。<sup>6</sup>

雖然他提出一些日語、韓語、漢語比較的意見，但距離「語言學」還很遠，把他看成是現代語言學家不免特意「拔高」之嫌。說1719年代日本已經誕生了現代共時語言學意義的「漢字音方言比較」，這和我們的認知差距太大。

## 2. 伊澤修二是現代漢語語言學家嗎？

〈辨正〉(2017a: 82-86)針對〈拙文〉(1994: 63)所言「(六角恒廣)……他把民間學者伊澤修二捧為戰前唯一科學地、實證地研究中國語的學者，但是對語言學者小川尚義不說一句話。其實呢，伊澤修二只是比其他的門外漢所謂中國語教材編者多懂得一些語音學的知識，他並沒有做過純語言學的漢語研究。」專設第三節「關於伊澤修二漢語音韻研究史實的辨正」，引用維基百科有關伊澤修二的介紹，包括留美期間向貝爾學習「視話術」、又學習音樂教育、聾啞教育……回國後擔任東京音樂學校(現在の東京芸術大學音樂學部)、東京盲啞學校(現在の筑波大學附屬視覺特別支援學校)校長，來臺創立「芝山巖學堂」……。

但這些都與語言學無關，有關的是他的語言相關著作：《視話應用·清國官話韻鏡》(1904)、《支那語正音發微》(1915)，他(2017a: 84、86)說：

伊澤修二受過蘭學薰陶，又留學美國，在當時的日本語言學界有幾個人會具有如此海外語言學學習經歷和背景？他所擁有的顯赫地位非同尋常，還出版過在世界漢語教育史上影響巨大的《視話應用·清國官話韻鏡》、《支那語正音發微》等著作，……洪惟仁教授的結論能夠成立嗎？可見，這個結論也是需要重新檢討的。

必須承認，伊澤修二對於日語、中國語推廣教育的貢獻值得肯定，但我也讀過伊澤修二的《視話應用·清國官話韻鏡》(1904)，我認為那不過是一本有創意的中國語發音教科書，無法承認是「現代漢語語言學」的研究。

<sup>6</sup> 引自 <http://21coe.kokugakuin.ac.jp/db2/kokugaku/arai.002.html>。

就〈辨正〉(2017a: 83) 所引維基百科的介紹也只說他是「明治時代の日本の教育者、文部官僚。近代日本の音楽教育、吃音矯正の第一人者である。」並沒有說他是語言學家。說他是現代語言學家，不免特意「拔高」之嫌。

### 3. 猪狩幸之助

〈問題〉(2017b: 96-99) 又舉「猪狩幸之助《漢文典》」說：「……對三十六字母用羅馬字進行了『擬音』…… 猪狩幸之助《韻鏡》音構擬，是繼承前人幾百年的研究成果，不是空穴來風。19世紀末，歐美比較語言學理論已經傳入到了日本，歐美學者對比較語言學漢語語音研究的模式，也引起了日本《韻鏡》研究者的興趣。比如對外國學者，猪狩幸之助專列『ボルピセリ (Volpicelli 沃爾皮切利)《古韻考》(1896年)』條加以介紹（第120頁）。他說，Volpicelli (沃爾皮切利) 依據《康熙字典》卷首『第二等韻二十四表』，即《切音指南》，探求中古音，利用ガイル氏《字書》，以及 Dr. Mateer (美國人狄考文) 氏的 Mandarin Lesson (可能是其《官話類編》之外的《漢語課本》) 的著作。……」

從〈問題〉的介紹看來，猪狩幸之助好像真的是運用了現代語言學進行中古漢字音擬音的。但我們查看原文，還是不能承認猪狩幸之助 (1997) 是漢語語言學的作品。

按猪狩幸之助明治30年 (1897) 畢業於文科大學博言科，算是小川尚義 (1896 畢業) 的學弟。他有相當現代語言學的認識，也熟悉西方的語言學，但1898出版的《漢文典》畢竟只能說是一本漢文的語文教科書，相當於漢學「小學」的課本，不是研究專著。書中 (頁102-104) 討論到漢語聲韻學，引用了 Volpicelli (1896) 的擬音為「三十六字母」注音，卻不是自己的「擬音」，不能算是他的成就。

#### 4. 佐藤仁之助

〈問題〉(2017b: 102-104) 介紹「佐藤仁之助《速成應用漢學捷徑》……第五章《韻鏡》又分十二節：三十六字母、內轉外轉、韻圖空窠、去聲寄此、借韻、清濁、開音合音開合音、四等、十六攝、切字法、字音種類、字音類別。其三十六字母擬音……與猪狩幸之助《漢文典》附錄《〈韻鏡〉解釋》『三十六字母條』擬音一樣。」這些介紹，一見便知其內容相當於傳統中國音韻學、等韻學。

佐藤仁之助《速成應用漢學捷徑》(1910) 牽涉到「擬音」的只有第五篇「音韻」第一節「三十六字母」(頁 97)、第二節「內轉、外轉」(頁 99)，附上羅馬字。其音韻說明和猪狩幸之助《漢文典》類似，標音也一樣，應該只是引用了 Volpicelli (1896) 為「三十六字母」注音，不是自己的「擬音」。

從《速成應用漢學捷徑》書名就可以斷言它不過是一本教科書，不是一篇嚴謹的學術著作。

### 五、有待研究

本節所指的是手頭缺文獻，目前還沒有辦法確認李先生的辨正是否有理，有待研究的部份。

〈辨正〉(2017a: 69-70) (三) 節針對〈拙文〉(1994: 63) 所言「要說戰前日本唯一的漢語學家實在非小川莫屬」提出反證，如：高田忠周《漢字の原理》(1904)、廣池千九郎《支那文典》(1904)、信原繼雄《清語文典》(1905)、岡本保孝《韻鏡考》(1850)、大島正健《支那古韻考》(1898)、大矢透《周代古音考》(1914) 和《韻鏡考》(1924)、溝田新造《支那音韻ノ歴史的研究》(1915)、高畠彥次郎《支那語の言語學的研究》(1928-1931)、有坂秀世《音韻論》(1940)、侯野保和《臺灣日用土語集》(1895)、兼松磯熊《臺灣語發音學》(1900)、御幡雅文《滬語便商》(1908)……等戰前漢語語言學家不勝枚舉。

以上都是戰前名家。不過就所引發表年代來看，很少早於小川尚義(1907) 的，大部分是以後發表的作品。除了三之(一) 小節所討論過的後藤

朝太郎、高畠彥次郎、小倉進平是小川尚義的學弟（和橋本信吉同時於明治39年東京帝大言語學系畢業），可以確定是現代語言學者，其餘諸家沒有現代語言學背景，就筆者讀過的作品而言，基本上是以文獻為基礎而採用部份共時語言學語料佐證的語文學。譬如李先生多次提及的滿田新造、大矢透，我讀過他們的作品，認定是語文學研究。到底有幾篇稱得上是「現代漢語語言學研究」，即使是具有現代語言學基礎的作品，其學術上的成就如何，有待確認，筆者才疏學淺，大方之家有以教之，姑存而不論。

## 六、結語

以上是我詳讀李無未教授〈辨正〉和〈問題〉之後，就其所提的批評分四點做了回應或答覆。他的批評有的我同意，有的不同意。批評有理的，將來有機會再考慮全部接受或參考修正〈拙文〉。

有關錯引或誤會，在研討會已經做了解釋，李先生論文發表時並未參考修正。有關「現代語言學」的定義或認識不同，產生的歧見，暫時無法勉強，以後慢慢溝通，目前只能互相尊重了。至於李先生提及的文獻我手頭上沒有的、目前還沒有辦法確認是否有理，容我繼續研究。

謝謝李先生督促我重新檢討22年前發表的〈拙文〉，在這段期間讀了以前沒有機會詳讀的文獻，真正是獲益良多。有關「戰前的日本是否有現代漢語語言學研究」這個問題，〈辨正〉和〈問題〉的指正使我注意到戰前日本已經有成熟的現代漢語語言學研究，只是這些研究成果沒有被應用到漢語教學。這一點很感謝李先生的指正。這使我深刻體認到「盡信書不如無書」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道理。有關「最先將高本漢介紹給中國學界的不是羅常培」也是一樣，不再重複了。

雖然如此，〈辨正〉所舉大量的著作書目中，夠資格稱為「現代漢語語言學研究」的都是二十世紀的作品，並且都發表於小川尚義（1907）以後，沒有一篇足夠反證「小川尚義（1907）是第一篇現代漢語語言學研究作品」的主張，因而我仍然堅持小川尚義是第一位運用西方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漢語中古音的東方人現代漢語語言學者。我的信念有兩個歷史的支點：

## (一) 西方現代語言學東傳日本的時點

日本的「現代語言學」應該追溯到 1886 年東京大學改組為帝國大學，分為法、醫、工、文、理等五個分科大學。聘請的教授多半是歐洲人學者。同年其文科大學於原有的哲學、和文、漢文三學科（學系）之外，增設第四科「博言學科」（1900 年改名「言語學科」）。當時所謂「博言學」包括語文學或語言學。該系最重要的教授是 Basil Hall Chamberlain (1850-1935)。上田萬年從他那兒學到歐洲的語言學知識。接 Chamberlain 棒者是小川早期的老師 Karl Adolf Florenz (1865-1939)。<sup>7</sup> 1890 年上田萬年以公費留學德國，從青年語法學派大家 Karl Brugmann (1849-1919) 學習嚴謹的歷史語言學。1893 年上田萬年回國後在博言學科擔任講座教授，教比較語言學、語音學等，並積極主張吸收西方語言學，對傳統的「國學」做批判性的繼承。他對日本「國語學」的現代化貢獻很大，被尊稱為「日本語言學之父」，他培養了很多語言學家。小川尚義 1896 年畢業，是他最早的高足之一，在漢語語言學界出名的猪狩幸之助、後藤朝太郎、高畠彥次郎等都是他的學弟。

由此可知，日本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自 1886 年成立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博言科，聘請外籍語言學者開始萌芽，到上田萬年直接由德國引進，是直接承襲了當代歐洲青年語法學派的比較歷史語言學傳統，無待高本漢的博士論文（1915-1926）問世。

日本語言學自十九世紀末期起就和西方的語言學亦步亦趨，譬如 Volpicelli 於 1896 發表 *Chinese Phonology, an Attempt to Discover the Sounds of the Ancient Language and to Recover the Lost Rhymes*，猪狩幸之助《漢文典》（1898）就加以引用。猪狩知道引用 Volpicelli (1896) 恐怕也是因為他是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博言學科的學生。

由上述的歷史背景可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博言學科的成立在西方現代語言學東傳日本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此可以清楚了解上田萬年

<sup>7</sup> 有關早期博言科外籍語言學教師，參見柴田武在《上田萬年言語學》「序文」的介紹（上田萬年講述，新村出筆記，柴田武校訂 1975：1）。

的學生小川尚義能夠獨力進行「現代漢語音韻學」研究的理由。<sup>8</sup> 小川尚義早在本漢八年前發表他的「現代漢語音韻學」研究並不是一件突兀的事。

## (二) 研究方法決定論史觀

歷史學有所謂「史實」、「史識」、「史觀」，三位一體。<sup>9</sup> 沒有史實不成歷史，沒有史識歷史不成。所謂「史觀」是解釋歷史的哲學基礎，「史識」是辨別什麼史實可以成立為歷史的洞察力，「史實」指文獻資料。沒有「史觀」就沒有「史識」，沒有「史識」不管手上掌握了多少「史實」，都不能建構「歷史」。「史實」當然重要，但是漢語語言學研究史不是用零碎而雜駁的史實堆積起來的，是用語言學的「史觀」、「史識」貫串起來的。有正確的史觀、正確的史識、才可能篩選史實，建構正確的語言學研究史。沒有史觀和史識，即使羅列大量的語言研究史料，也不能建構語言研究史。

談什麼人的成就是「第一」，什麼是「劃時代的事件」，首先需要史實的考證，更重要的是如何判斷誰才能算「第一」，這需要「史觀」，這兩個條件具備了，才能有史識判斷誰是「第一」，也就是說誰是時代的開創者，什麼是

<sup>8</sup> 林初梅（2012：594）說：「上田萬年留德回國後立即任教於博言科，當時小川已經大二，我想小川終其一生以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研究南洋諸語，也許在受教於上田萬年以前已經受到外國人教師 Dr. K. Florenz 很大的影響。」他的證據是小川尚義的畢業證書記載小川曾經受教於 Dr. K. Florenz 有「博言學、希臘語、德語、聲音學、ロマンス語及チュートニック語比較文法、梵語」等，其中所謂比較文法就是比較歷史語言學。參考上引柴田（1975）的「序文」，我認為她的猜測是有根據的。根據《日本國語大辭典》（精選版）（1972-1976）的解說，Karl Adolf Florenz 1889 年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講授德語、德國文學、比較語言學。小川的比較語言學必然受教於 Florenz，但和上田萬年比較，誰的影響大無法比較。總之，十九世紀的語言學主要是比較歷史語言學，小川尚義的比較語言學淵源於博言科是無庸置疑的。如果不是，畢業後的 1907 年他能夠發表漢語比較語言學研究，後來終其一生進行南島語的比較語言學研究，無法解釋。

<sup>9</sup> 這裏是就「歷史」的構成而言，此外又有所謂「史才」、「史德」之說是就史學家修養而言。就語言史或語言研究史學者而言，沒有「語言史觀」、無法辨別語言史重要性的「史識」，無法掌握語料文獻等「史實」的人就沒有「史才」了；立論太過民族主義，對內提倡國語獨尊，合理化壓制、消滅弱勢方言或少數民族語言，惡意破壞語言生態的語言學家，或對於外國（特別是敵國）的語言學、語言學者不分青紅皂白一概抹殺、排斥、惡意貶低，或反之故意捧高，只能說沒有「史德」了。

劃時代的作品。

那麼我的「語言學史觀」是甚麼？一言以蔽之，就是「研究方法決定論」，掌握新的「方法論」的人，就是開創時代的語言學家！既然「現代語言學」是由西方傳來的語言學研究方法。那麼，在西方的現代語言學未傳來東方以前，具體的說，即高本漢沒有把現代語言學傳到中國以前，應該承認中國無所謂現代意義的「漢語歷史語言學」。在日本也一樣，可以斷言在 1886 年東京大學文科大學博言科成立，接著 1893 年上田萬年留德回國後在博言科擔任講座教授傳播比較歷史語言學的種子以前，日本不會有現代語言學意義的比較歷史語言學研究。

和上田萬年同時代的日本人，除非受過現代語言學訓練的，不可能進行現代語言學研究。伊澤修二不能算是「現代漢語語言學家」，這不但可以從他的作品來認定，也可以從他的求學資歷來推斷。至於其他具語言學知識而沒有語言學訓練的「國學者」或「漢學家」，即便引用了現代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來佐證其傳統音韻學、等韻學研究，不是植基於共時語言學基礎的研究，都不是我定義的「現代漢語語言學」研究。

斷言小川尚義（1907）比高本漢（1915-1926）早 8 年發表「現代漢語音韻學」研究需要史實的考證，但是如果沒有牢牢掌握「比較歷史語言學」、「現代語言學」方法論的劃時代意義，很可能看不到小川尚義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當然也可能不了解高本漢在漢語研究史上的意義，或者可能把非「現代語言學」，甚至非「語言學」的「語文學」研究當成是「現代語言學」。

### （三）「現代語言學」和「傳統語文學」是不同分科

我這樣說，對於傳統音韻學家、等韻學家，即語文學家，毫無不敬之處。我絕對沒有否定傳統「語文學」的價值。我對漢語音韻學相當熟悉，我本人對閩南語文獻、包括閩南語研究史的研究有目共睹。我怎麼可能輕視語文學？

精密的文獻考證是建構正確的語言史的要件之一。中國的音韻學家在廣韻學、古音學上有悠久而深厚的學術傳統；日本保存了《韻鏡》，加上日文豐富的假名文獻，使得日本「國學者」或「漢學家」具有漢語音韻學史研究的優越

條件。但是「語文學」研究的對象畢竟是「語言」，語言文獻不等同於語言。不知今、焉知古，如果沒有引進以共時語言學為基礎的現代語言學，絕對走不出傳統文獻的迷宮。中國的聲韻學、古音學如此，日本的韻鏡學也一樣。

對於現代漢語語言學者，我也要說同樣的話。漢語具有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文獻，完全從共時語言學出發，不顧文獻所提供的語言史訊息，要搞漢語歷史語言學絕對是走不通的。

「現代語言學」和「傳統語文學」是不同分科。就歷史語言學來說，前者是從共時語言學出發來研究漢語史，其研究過程必須參考文獻的研究成果，得到文獻的印證，才能具有證據力。後者是從文獻學出發研究漢語史，其研究也要參考現代語言學的研究成果，解析文獻上的語言現象，才能更具證據力。

因此「現代語言學」和「傳統語文學」兩個學科可以說是互補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語言學家不能輕視語文學研究，語文學家更不能忽視語言學研究（特別是方言學研究）。當然，既精於共時語言學，又精於文獻學是再好不過的了。但是「語言學」和「語文學」是無法混淆的，不能誤以「語言學」比較高級，就把「語文學」研究說成語言學研究；或以為「語文學」研究低人一等，而有自卑之感，進而反彈成拒絕或反對現代語言學。語言學家也不要以為「語文學」比較低級，對於語文學研究不屑一顧。語言學與語文學可以說是建構語言史的兩輪、雙翼，缺一不足以成行。

## 引用文獻

小川尚義，1907，〈日臺大辭典·緒言〉，收入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編，小川尚義主編《日臺大辭典》（出版地不詳：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頁1-212。又出版於1993年，洪惟仁編著《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五冊·日臺大辭典上），臺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李方桂，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9.1/2：1-61。又出版於198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

李無未，2017a，〈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音韻研究重要史實辨正——向洪惟仁教授請益一〉，《聲韻論叢》20：63-90。

李無未，2017b，〈小川尚義中古音「擬音」及與高本漢比較「非對稱性」問題——向洪惟仁教授請益二〉，《聲韻論叢》20：91-122。

李無未、秦曰龍，2008，〈高本漢「二手材料」構擬《廣韻》之檢討〉，《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48.1：115-122。

洪惟仁，1994，〈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之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臺灣史研究》1.2：25-84。

羅莘田（羅常培），1935，〈中國音韻學的外來影響〉，《東方雜誌》32.14：35-45。

〔瑞典〕珂羅倔倫（高本漢），林語堂譯，1923，〈答馬斯貝囉（Maspero）論切韻之音〉，《國學季刊》1.3：475-498。又收入林語堂《語言學論叢》（上海：開明書店，1933年），頁162-192。<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TUL-9910001964/reader>

〔瑞典〕高本漢，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1940，《中國音韻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イ・ヨンスク（Lee Younsuk，李妍淑，이연숙），2005，《「国語」という思想——近代日本の言語認識》。原刊於1996年，東京：岩波書店。

カールグレン（高本漢），岩村忍、魚返善雄譯，1937，《支那言語學概論》，東京：文求堂書店。

上田萬年講述，新村出筆記，柴田武校訂，1975，《上田萬年言語學》。東京：

教育出版。

大矢透，1924，《韻鏡考》，著者出版。又出版於1978年，《韻鏡考·隋唐音圖》（上下冊）（勉誠社文庫41、42），東京：勉誠社。<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70824>

大矢透，國語調查委員會編纂，1914，《周代古音考》，東京：株式會社國定教科書共同販賣所。<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870322>

大島正健，1898，《支那古韻考》，大阪：丸善書店。<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93666>

六角恒廣，1961，《近代日本の中国語教育》，東京：播磨書房。又出版於1984年，東京：不二出版。

日本大辭典刊行会編，1972-1976，《日本國語大辭典》（精選版），東京：小学館。

伊澤修二，1904，《視話應用·清國官話韻鏡》，著者出版。<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089170>

伊澤修二，1915，《支那語正音發微》，著者出版。<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56856>

佐藤仁之助，1910，《速成應用·漢學捷徑》。東京：東亞堂書房。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8709>

東京帝國大學，1919，《東京帝國大學一覽·從大正七年至大正八年》，東京：東京帝國大學。<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40169>

林初梅編，2012，《小川尚義論文集：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ける台灣諸言語研究》（復刻版），東京：三元社。

後藤朝太郎，1908，《現代支那語學》。東京：博文館。<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9281>

高畠彥次郎，1928-1931，〈支那語の言語學的研究〉（一二十三完），《藝文》  
19.8：529-546、19.9：619-639、19.10：690-719、19.12：845-869、20.1：19-33、  
20.2：102-134、20.3：228-248、20.5：389-411、20.8：647-677、20.9：732-753、  
20.11：901-920、20.12：942-967、21.1：49-64、21.3：212-228、21.4：313-323、  
21.5：414-423、21.6：504-520、21.7：595-605、21.8：672-690、21.10：818-832、

21.11 : 906-923、21.12 : 995-1012、22.2 : 154-158。

猪狩幸之助，1898，《漢文典》。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8819>

満田新造，1915，〈支那音韻ノ歴史的研究〉（《支那音韻断》改題），收入氏著，満田新造博士遺著刊行會編《中國音韻史論考》（東京：武藏野書院，1964年），頁1-133。<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42679>

Giles, Herbert A. 1892.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Shanghai: Kelly & Walsh;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Reprinted in 1912, 2nd edition (revised & enlarged).

Karlgren, Bernhard. 1915-1926.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Leyde: E.-J. Brill.

Volpicelli, Z. 1896. *Chinese Phonology, an Attempt to Discover the Sounds of the Ancient Language and to Recover the Lost Rhymes of China*. Shanghai: China Gazette Office.

## 參考文獻

大矢透，1924，《隋唐音図》，《國學院雜誌》20卷7號。又出版於1932年，東京：大村書店。又出版於1978年，《韻鏡考·隋唐音図》（上下冊）（勉誠社文庫41、42），東京：勉誠社。

大島正健，1930，《漢字音韻考》，著者出版。<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033241>

伊澤修二，1895，《日清字音鑑》，東京：並木善道。又出版於1900年，東京：大日本圖書。<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9477>

伊澤修二，1904，《視話應用·清國官話韻鏡音字解說書》，著者出版。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089165>

有坂秀世，1940，《音韻論》。東京：三省堂。<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126173>

信原繼雄，1905，《清語文典》。東京：青木嵩山堂。<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9394>

俣野保和，1895，《臺灣日用土語集》。東京：民友社。<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9413>

- 倉石武四郎，1941，《支那語教育の理論と實際》，東京：岩波書店。
- 兼松磯熊，1900，《臺灣語發音學》，稻江義塾藏版。
- 時枝誠記，1932，《國語學史》，《岩波講座·日本文學》(第15回)，東京：岩波書店。又出版於1940年，東京：岩波書店。
- 高田忠周，1904，《漢字の原理》。東京：吉川半七。<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2247>
- 魚返善雄，1937，〈支那言語学の任務と方法〉，《中國文學月報》24：1-4。
- 廣池千九郎，1904，《支那文典》。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91500>
- Marshman, Joshua. 1809. *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cluding Tables of the Elementary Characters, and of the Chinese Monosyllables.* [Serampore]: [s.n.].
- Maspero, Henri. 1912. “É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Les Initial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EFEO)* 12.1: 1-127.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anguijin@gmail.com

#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odern Linguistics and Traditional Philology

## ——A Response to Two Papers by Professor Li

*Ang, Unjin\**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spond to Professor Wu-Wei Li's two papers (Li 2017a, 2017b) that criticize Ang (1994) for overestimating Naoyoshi Ogawa's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i contends that Ogawa (1907) is not the first in Asia to conduct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degrades Ogawa (1907) for not being on a par with Karlgren (1915-1926). This paper reassesses the counterexamples that Li furnished and responds to his arguments one by one. I gratefully accept some of Li's criticisms, but insist that there was no research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n terms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of modern linguistics until Ogawa (1907). I conclude tha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s is attributable to a difference in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I propose a “methodology decision theory” and argue that Japan would not have had comparativ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until it was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 Ultimately, it is my conviction that modern linguistics and traditional philology are different disciplines, which are mutually complementary but not in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Linguists of these two fields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 enhance the validity of their research.

**Keywords:** Naoyoshi Ogaw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methodology, modern linguistics, traditional philology

---

\*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